

看懂中國及傳藏佛教

呂冬倪
—
著





第一單元

「中國佛教」的歷史

公元前五六五年，「釋迦牟尼佛」在「古印度」誕生，三十五歲開悟後，創立了「佛教」。目的是引導衆生了知「宇宙人生的真相」、「苦樂的真諦」，以及「離苦得樂的方法」。

「佛教」傳入「中國」和發展，大約是在「東漢明帝」時期，約在公元六十七年左右。最流行的傳說是，「東漢明帝」夢見「金人」，於是遣使求法，立「白馬寺」於「洛陽城」雍門西。

「佛教」剛傳入「中國」時，被稱爲「浮屠教」。根據文獻記載，「佛像」可能在此同時傳入「中國」。

根據《善見律毗婆沙》的記載，在「阿育王時代」，「佛教」第三次結集後，曾經派大德「摩訶勒棄多」至「與那世界（漢地）」；派「末世摩」至「雪山邊國」。

「佛教」由「古印度」傳入「中國」，經過長期的傳播發展，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「中國佛教」。由於傳入的時間、途徑、地區和民族文化、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，「中國佛教」形成三大系，即「漢地佛教（漢語系）、藏傳佛教（藏語系）、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（巴利語系）」。

「佛教」在「中國」的「南北朝時期」得以弘揚，至「唐代」達到鼎盛。但是，「佛教」在「印度」，卻於十三世紀初消亡，被「印度教」的「商羯羅」趕出了「印度」，而在「中國」卻遍地開花，成爲「大乘佛教」的發展地。「大乘佛教」提倡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行。」，利益一切衆生的「菩薩道精神」。

一、先秦時期

實際上，「佛教」在「漢朝」之前，就已經傳入「中國」。例如：「東晉」時期，「王嘉」編寫的「神話志怪小說集」《拾遺記卷四》記載：昭王乃徹色減味，居乎正寢，賜甘需羽衣一襲，表其墟為「明眞理」也。七年，「沐胥之國」來朝，則「申毒國」之一名也。道術人名「尸羅」。問其年，云：「百三十歲。」荷錫持瓶，云：「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。」善術惑之術。於其指端出「浮屠」十層，高三尺，及「諸天神仙」，巧麗特絕。人皆長五六分，列「幢蓋」，鼓舞，繞塔而行，歌唱之音，如「真人」矣。

意思是說：燕昭王七年（公元前三二七年），「沐胥（即印度）」之國來朝，有道術人名「尸羅」荷錫持瓶，說：「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」，這可能是「佛法」進入中國的開始。

《列子·仲尼篇》記載：「丘聞西方有聖人焉」，因此「唐代」的「道宣律師」認為「孔子深知佛為大聖」。

「東漢」的知名道士「費長房」在《歷代三寶紀》卷一記載：「又始皇時。有諸沙門『釋利防』等十八賢者。齎經來化。『始皇』弗從。遂禁『利防』等。夜有『金剛』丈六人來破獄出之。『始皇』驚怖稽首謝焉。」

意思是說：秦始皇四年（公元前二四三年），沙門「釋利防」等十八位「賢者」，攜帶「佛經」來渡化「秦始皇」，「秦始皇」不信「佛教」，把他們關進牢裡。半夜，有「金剛」打破「牢獄」，把「釋利防」等人救走。





唐代「法琳」的《破邪論》也有此說：「『始皇』之時。有外國沙門『釋利房』等一十八賢者。齎持佛經來化『始皇』。『始皇』弗從。遂囚禁房等。夜有『金剛』丈六人。來破獄出之。『始皇』驚怖。稽首謝焉。」

二、東漢時期

歷史上，大多以「東漢明帝」感夢求法，作為「佛教」正式傳入「中國」的開始。考察現有的資料，「東漢明帝」感夢求法的傳說，還是比較可信的，但它不是「佛教」傳入「中國」的開始。

《魏書·釋老志》記載：及開「西域」，遣「張騫」使「大夏」還，傳其旁有「身毒國」，一名「天竺」，始聞有「浮屠之教」。「哀帝」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「秦景憲」受「大月氏王」使「伊存」口授「浮屠經」。「中土」聞之，未之信了也。

根據《魏書·釋老志》的記載，「漢哀帝」元壽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，「大月氏」的使臣「伊存」，向博士弟子「秦景憲」口授《浮屠經（佛經）》。可見「佛教」早在公元前，就傳到「中國」了。

另外，在《三國志》裡，也有同樣記錄，其中記有「東漢末葉」，哀帝元壽元年（西元前二年），博士弟子「景廬」，從「大月氏王」的使者「伊存」，口授《浮屠經（佛經）》，這也是有關「佛教」傳入「中國」的最古資料。

《三國志·魏書三十·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·西戎傳》記載：「罽賓國、大夏國、高附國、

天竺國」皆並屬「大月氏」。「臨兒國」，《浮屠經》云其國王生「浮屠」。「浮屠」，太子也。父曰「屑頭邪」，母云「莫邪」。

「浮屠」身服色黃，髮青如青絲，乳青毛，鈴赤如銅。始「莫邪」夢「白象」而孕，及生，從母「左脅」出，生而有結，墮地能「行七步」。此國在「天竺城」中。「天竺」又有「神人」，名「沙律」。

昔「漢哀帝」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「景盧」受「大月氏王」使「伊存」口受《浮屠經》曰復立者其人也。《浮屠》所載「臨蒲塞、桑門、伯聞、疏問、白疏問、比丘、晨門」，皆「弟子」號也。《浮屠》所載與中國《老子經》相出入，蓋以爲「老子」西出關，過「西域」之「天竺」、教胡。

但是，「佛教」正式傳入「中國」的年代，是從「東漢明帝」感夢求法開始算起。

《後漢書·列傳·西域傳》記載：世傳「明帝」夢見「金人」，長大，頂有光明，以問群臣。或曰：「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。」帝於是遣使「天竺」問佛道法，遂於「中國」圖畫形像焉。「楚王英」始信其術，「中國」因此頗有奉其道者。後「桓帝」好神，數祀「浮圖」、「老子」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後遂轉盛。

《魏書·釋老志》記載：後「孝明帝」夜夢「金人」，頂有日光，飛行殿庭，乃訪群臣，「傳毅」始以「佛」對。「帝」遣郎中「蔡愔」、博士弟子「秦景」等使於「天竺」，寫「浮屠」遺範。「愔」仍與沙門「攝摩騰、竺法蘭」東還「洛陽」。「中國」有「沙門」及「跪拜之法」，自此始也。「愔」又得「佛經四十二章」及「釋迦立像」。「明帝」令「畫工」圖佛像，置「清涼





臺」及「顯節陵」上，「經」緘於「蘭臺石室」。「愔」之還也，以「白馬負經」而至，「漢」因立「白馬寺」於「洛城」雍門西。「摩騰、法蘭」咸卒於此寺。

「韓愈」在上書「唐憲宗」的《論佛骨表》中也說，「佛者，……自後漢時流入中國……『漢明帝』時始有佛法。」

把「古書」的記載，用白話文來解釋如下：在「東漢」永平七年（公元六十四年），某一天夜裡，漢明帝「劉莊」作了一個夢。他夢見一個身形高大，脖子有日光的「金人」，在空中飛行，最後落到自己的殿庭之前。自己見到「金人」後，心裡十分愉快。

第二天早朝，「漢明帝」召集群臣「解夢」。太學閭人「傅毅」回答說：「周昭王時，西方有『佛』出世，其身長一丈六尺，遍體金色。『陛下』夢中所見的『金人』，或許就是『佛』吧！」

「漢明帝」念念不忘自己在夢中見到「金人」時，心中感受到的歡樂，聽了「傅毅」的解說後，決定派遣使臣到「西方」去尋求「佛法」。西行求法的使臣有：中郎將「蔡愔」，博士「秦景、王遵」等十八人。

（一）「攝摩騰」和「竺法蘭」

當他們辛辛苦苦趕到與「天竺」毗鄰的「月氏國」時，遇見了正在弘揚佛法的「天竺」沙門「攝摩騰」和「竺法蘭」，於是便懇請兩位「沙門」，到「漢地」傳法。「攝摩騰」和「竺法蘭」兩人同意，便和「蔡愔、秦景」等一行人，偕用「白馬」馱著「佛經、佛像」，一起東還到「中國」。終於，在永平十年（公元六十七年），他們一行人回到了「洛陽」。

相傳，「攝摩騰」等人帶來的「佛像」，形貌與「漢明帝」夢中的「金人」一般無二。「漢明帝」看見後十分高興，下令把「佛像」安放在「南宮清涼台」供養，「佛經」則收藏在「蘭台石室」裡，兩位「沙門」住在招待外國人的「鴻臚寺」中。

第二年，「漢明帝」又下詔書，令在城西「雍門」外建造「精舍」，作為兩位「梵僧」居住和譯經的場所，其遺跡就是現在「洛陽市」的「白馬寺」。此後，外來的「僧人」增多，處處修立「佛寺」，「佛教」便在「中國」迅速傳播開來。

所以結論，在「佛教歷史」上，大多以「東漢明帝」永平十年（公元六十七年），「攝摩騰」與「竺法蘭」以「白馬馱經像」來「中國」，定為「佛教」傳入「中國」之年。

而歷來，都以「東漢」永平年間（公元五十八年到七十五年），「漢明帝」遣使「西域」取回《四十二章經》，為「佛法」傳入「中國」的開始。《四十二章經》是「攝摩騰」和「竺法蘭」，兩人所共同翻譯。

《四十二章經經序》稱：昔「漢孝明皇帝」夜夢見「神人」，身體有金色，項有日光，飛在殿前，意中欣然，甚悅之。明日問群臣：「此為何神也？」有通人「傅毅」曰：「臣聞天竺有得道者，號曰佛，輕舉能飛，殆將其神也。」於是上悟，即遣使者「張騫」、羽林中郎將「秦景」、博士弟子「王遵」等十二人，至「大月支國」寫取「佛經四十二章」。

（二）「安世高」和「支婁迦讖」

在「東漢時期」，有四位最重要「翻譯佛經」的僧人，除了上述的「攝摩騰」與「竺法蘭」之





外，還有「安世高」和「支婁迦讖」。

東漢「漢桓帝」建和元年（公元一四七年），「安息國」太子「安世高」東來「洛陽」，致力譯經二十餘年，翻譯有《安般守意經》、《陰持入經》、《四諦經》、《八正道經》、《切流攝守因經》、《本相猗致經》等三十餘部，後歷經散失，現存二十二種，二十六卷。「安世高」是中國翻譯佛經的第一人，傳譯以「小乘經論」為主。

東漢「漢桓帝」末年，「大月支國」的「支婁迦讖」至「洛陽」，翻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，皆「大乘佛學」，為最早將「大乘佛教」典籍，翻譯成中文的「譯經僧」，為「大乘經典」漢譯的開始。其中，以《道行般若經》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和《般舟三昧經》為最。

三、三國時期

在「魏、吳、蜀」三國鼎立的時代，活躍於江北的「翻譯家」，有中印度的「曇柯迦羅」、康居的「康僧鎧」、安息的「曇諦」等，先後來到魏都「洛陽」，從事「譯經」。在江南則有吳國的「支謙」、康居的「康僧會」等。

（一）「曇柯迦羅」、「康僧鎧」、「曇諦」、「朱士行」

其中的「曇柯迦羅」，於「魏廢帝」嘉平二年（公元二五〇年），在「洛陽」譯出《僧祇戒本》，「曇諦」則在「白馬寺」譯出《四分律》的受戒作法《曇無德羯磨》，主張僧眾應遵佛制，

稟受歸戒，爲「漢地佛教」有「戒律、受戒」的開始。

在此之前，「中國僧尼」僅知「剃髮」，而不熟悉正規的「受戒」作法，名爲「羯磨法（出家進入僧團的儀式）」，據說依此法而首先出家的中國人，就是「朱士行」。

「朱士行」是「潁川（河南省）」人，精通《般若經》，偶爾在「洛陽」講《道行般若經》，發覺與原典不同，而知道不完全，便於「魏國」的甘露五年（公元二六〇年），從「雍州（陝西省長安）」出發，遠赴「于闐」，得二萬五千頌《般若經》的原典。

「康僧鎧」則譯出《鬱伽長者所問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等四部。

（二）「支謙、康僧會」

「支謙、康僧會」等前往吳都「建業（今江蘇南）」弘法，「支謙」深得「孫權」禮遇，拜爲「博士」，並爲「康僧會」建立寺塔。

「吳國」翻譯佛經，開始於「武昌」，盛行於「建業」。「支謙」專以「譯經」爲務，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，共八十八部，一百一十八卷，現存五十一部，六十九卷；「康僧會」譯出《六度集經》九卷等。

當時譯經，大小乘並重。「小乘經典」強調「禪法」，注重「守意」；「大乘經典」偏重「般若」。這個階段的「譯經工作」和對教義的宣傳、研究，爲「魏晉南北朝時期」佛教的發展，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。此外，這個時期的「寺塔建築、佛像雕塑」也各具規模，但今存極少。

至於當時的「蜀地」，尚未有「佛教」傳入。

